

士气之藩篱： 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赵 思 渊

摘 要：同治初年，常熟形成以世家大族为特征的地方权力格局。戊戌政变期间，这些世家大族卷入朝廷权力斗争，翁同龢等人与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成为政敌。戊戌政变后，刚毅清理田赋，对常熟士绅进行政治打击。当地青年士绅不满地方权力结构，他们组织中西学社，争夺由世家大族控制的地方经费。他们也不满刚毅的政治打击，沈鹏在《国闻报》刊布弹劾刚毅等人之奏稿，引起朝野震动。徐兆玮提出“士气”论，认为士绅应当承担田赋征纳的责任，参与地方事务，进而伸张民权。这种思想受到江南经世思想传统及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常熟青年士绅的普遍观念。清末新政之后，认同“士气”论的常熟青年士绅逐渐主导地方政治，开启了新的地方权力格局。

关键词：地方政治 戊戌政变 徐兆玮 民权 田赋

引 言

清末民初是士绅群体身份意识剧烈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地方政治的实践与权力构造。王先明认为，维新派所提倡的民权之核心是绅权，绅权的核心则是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废科举之后，成为士绅的渠道多元化，清末新政之后，士绅获得公共权力的形式则由传统的非正式官府邀请变为正式的参政机制。士绅的形象继而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民间对多元的士绅占据公共权力与“士”之身份的反抗。^① 废除科举与自治运动，是士绅身份意识转变的关键因素，相关研究也最充分。^② 但学界尚未充分注意到的是，清赋问题是推动士绅身份意识转变的另一条线索。以清赋为基础的地方财政体制始终是清代地方政治实践中的核心议题，因而士绅控制公共资源，也必然从清赋问题入手。清赋问题也将清代学术中的经世学传统与西学中的民权观念、经济学等思想资源联系了起来。清赋问题对士绅身份意识的影响，在清末自

① 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6—440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120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等。

治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清末常熟^①士绅与高层政治之间的错综关系，以及他们所留下的丰富史料，都清晰地反映了清赋、新学与士绅身份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清末常熟地方政治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从清赋问题的角度理解清末民初地方士绅的身份意识转变过程。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常熟士绅徐兆玮在《清赋末议》中提出，“凡在搢绅各宜争先输纳，为民户倡。州县不得以声色相加遗，总书不敢以尔汝相轻侮。庶几为吴中延一线之士气，而不至荡焉渐灭也”。^②什么是“士气”？“士气”为何与“争先输纳（赋税）”有关？徐兆玮的话提供了理解士绅身份意识与田赋问题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说法并非僻处一隅的野夫乱言，而是由戊戌政变之后紧张的政治气氛直接促发的。常熟是翁同龢的故乡，翁同龢是常熟士绅的领袖。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翁同龢被革斥回乡；戊戌政变后，清廷下旨，对翁同龢“永不叙用”。二十五年五月，刚毅被派往江苏巡视筹饷，他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并且在政治上强烈敌视翁同龢。他清理田赋的行动，正是从处置一名常熟籍举人开始的。为了搜罗更多财源，刚毅对整个苏南士绅采取打压态势，常熟更是其始终关注的重点。

“士气”论连接了经世学传统与新学思想资源，也试图突破戊戌政变后保守的政治气氛。由此进一步发展，清末最后十年中，常熟青年士绅将自己视作民权代表，由绅权而民权，越来越多地利用报纸、学堂、自治运动等新的机制参与地方政治，深刻改变了地方权力格局。徐兆玮的论说虽是一家之言，常熟的地方政局虽是一县之变，但我们可从中窥见清末民初地方权力格局演变的关键。新学促发了权势转移，代际更替加剧了这种转变，地方经费的重新分配则是权势得以转移的基础。中央政局的变动与制度改革，更为关键地控制了权势转移的节奏。

一、清末常熟大族与高层政治

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是常熟士林变动的导火索，刚毅清赋政策的核心则是江苏候补道朱之榛制定的《清理章程》。朱之榛在《清理章程》中特别批评苏南的大家族“须知苏镇两属短完之弊，其初一县不过数大家或犹借善堂为辞，既而陋风所遍，咸谋染指”。^③朱之榛认为苏南大家族利用善堂、义庄隐匿钱粮，是苏州、镇江短欠钱粮的主要原因。《清理章程》所言，并非诬陷士绅，《申报》一篇批评清赋政策的文章，也有类似说法。同治初年，胡林翼清理苏州田赋，奏请缴纳钱粮的银钱比价全部统一，唯有常熟、昭文仍然以较高银钱比价短完钱粮。“盖彼处搢绅巨族冠盖相望，州县官瞻徇情面，势固有所难行也。”^④可见当时苏州世家大族短欠钱粮现象的确存在，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常熟。

清中叶以降，常熟科举发达，由此形成了不少累代中进士的世宦家族，当地有“八大家族”的说法，称之为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蒋、屈好名声。^⑤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翁氏家族，翁氏家族中的翁同龢在戊戌维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戊戌政变前夜，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

① 本文所说的常熟，指清代苏州府所属的常熟、昭文两县。昭文县于雍正三年（1725）从常熟县划出，两县的县衙在同一城中，民国合并为常熟县。当时士绅的论述中，也通常将两县合称，两县在文化、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上可以认为是同一的。

② 《清赋说劝绅》，《徐兆玮日记》第1册，李向东等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02页。

③ 《督办清理赋税局聂、朱会详清理赋税章程》，《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第3版。

④ 《论绅衿包抗钱粮》，《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第1版。

⑤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常熟掌故》，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第155页。

太后，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促使慈禧太后返回宫中，两日后便幽禁光绪帝。^①成为戊戌政变导火索的杨崇伊，也来自常熟。由此可见，常熟出身的世家大族的确有其独特性，他们不仅是地方权力的主导者，其涉入高层政局之深，江苏其他地方士绅不能比拟。因而对这些世家大族的发展，有必要予以梳理，这是笔者将要讨论的士绅身份意识与田赋关系的社会基础。

翁氏家族自乾隆末年的翁咸封始，连续三代通过科举发达，翁同龢兄弟三人均活跃于晚清政坛。翁同龢虽然声望最大，但长期在京城居官，并且没有子嗣，对于翁氏家族在常熟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其兄弟翁同爵。翁同爵以父荫得兵部主事，历任四川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湖北巡抚。^②更重要的是，他在常熟兴建翁氏宗祠及义庄，其子翁曾荣还参与抵抗太平军对常熟县城的进攻，翁同爵这一房支更多地体现和维护了翁氏家族的在地利益。

杨氏家族崛起于乾隆末嘉庆初，聚居于常熟西部的田庄镇。^③尤其是其希字辈、孙字辈，出现几位重要人物。杨希钰有子嗣三人，杨泗孙、杨沂孙、杨汝孙。杨泗孙和杨沂孙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至晚年退官回到常熟。杨沂孙居家讲学，“里中后进，多讲求六书及诸子之学者，沂孙提倡之力也”。^④杨汝孙的儿子杨崇伊由科举进入仕途，先后任编修、御史。杨崇伊与李鸿章是姻亲，戊戌变法期间的权力斗争中，弹劾文廷式，属于李鸿章派系。^⑤但他密奏慈禧太后的行为遭到常熟青年士绅激烈批评。1902年，常熟人孙景贤创作的时事小说《轰天雷》中，将杨崇伊化名为“羊都御使”，并写成李莲英的义子。孙景贤在小说中托沈鹏之口：“常熟既出了一个巨奸大滑，罪魁祸首，必须再出一个为国忘身的大忠臣，方给吾常熟人争争气！不然，我们的脸子都辱没尽了！”^⑥曾朴在小说《孽海花》中所写的反面人物“尹御史”也是影射杨崇伊。

除翁氏、杨氏两大家族外，庞氏家族也在太平天国运动后进入高层政局。庞氏起家于常熟西北塘桥镇，道光年间有进士庞大堃、庞大奎兄弟，其后代庞钟璐、庞钟琳、庞钟瑚等人训练民团对抗太平军，庞钟璐投奔李鸿章从而获得政治上的回报，进入朝廷中枢。^⑦其两子也都在光绪年间担任高级学官或地方大员。可以推断，同治至光绪年间，庞氏家族在常熟的影响力仅次于翁氏家族。光绪末年，庞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庞鸿文，他“家居者凡十年，时方改书院为学堂，邑人以主任相推，为之规画条理，事无不具”，并且“摘集邑中掌故，参访考订，成《常昭合志》四十卷”。^⑧至清末新政时，他当选为苏州实业协赞会的常熟代表。由此可见，庞鸿文是翁同龢之外常熟最重要的士林领袖。

道光年间，江阴人季芝昌迁居常熟，他在道光末年进入朝廷中枢。其子季念诒曾经组织对抗太平军的地方武装，获得战功。至第三代季邦祯，为同治十年（1871）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与庞氏类似，他们也凭借对抗太平军的战功强化了家族声望，成为同治初年至光绪前期常

①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2页。

②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34、1084页。

③ 张大镛：《恬庄小识序》，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915页。

④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第1087页。

⑤ 汤志钧编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50页。

⑥ 藤谷古香（孙景贤）：《轰天雷》，董文成、王明琦校点，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2—83页。

⑦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第1085页。

⑧ 庞鸿书：《清故通奉大夫通政使司副使先兄纲堂庞公墓志铭》，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熟具有声望的大家族。言氏家族在常熟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被认为是孔门诸贤之一的言子即子游的后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言氏家族被封为世袭五经博士，其声望主要来自这一礼仪性的身份。归氏家族的活跃期是明末清初及乾隆后期至咸丰初年。归宣光、归梦燧、归景照等人均活跃于官场，归銮曾拿出上千亩土地设立族田与族学。但同治以后，常熟士林中并没有十分重要的归氏成员。屈氏世居常熟城南，自乾隆年间通过科举获得发展，逐渐购置土地，设置祠堂、义庄，但道光之后再没有出现高级官员。^① 蒋氏在乾隆初年最具声望，号称“门第甲江左”，但道光末年已经家道中落。光绪中期，蒋士骥主讲鹿苑、塘桥书院，“邑中奉为大师”。并且还主持地方公事，“凡邑中有大徭役，若濬河、团防、赈荒，当事必倚公位重”。家族声望有所恢复。^②

总之，虽然“八大家族”并称，但是在同治初年，翁氏、庞氏、杨氏家族最具声望，也最具政治实力。常熟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以及地方政治与高层政局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这些大家族实力消长的影响。光绪二十五年，翁同龢斥革在家，庞鸿文开缺回籍。朝廷中能够代表常熟地方利益的仅有杨崇伊，当年十月，他上奏批评刚毅清赋“有碍民力”。^③ 但杨崇伊仅位居御史，实力不足以与刚毅等人抗衡，无法抵制刚毅的政策执行。

光绪二十五年之际，居于常熟地方权力格局核心的世家大族，不但不能有力维护地方利益，而且他们所把持的善堂、义庄，成为清赋政策直接打击的对象，《清赋章程》中特别指出，“善堂、义庄，顾名思义，尤不应上侵国课，当与绅民一体输将，不得强自区分，再有短欠”。^④ 同治初年，常熟形成以世家大族为特征的地方权力格局，到戊戌政变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由此应运而生的是，一些非大族出身的青年士绅开始寻找新的途径维护地方利益与士绅尊严。

二、常熟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

张鸿、徐兆玮、丁祖荫、曾朴等人是常熟非大族出身的青年士绅的核心人物。清末自治运动中，徐兆玮参选自治议员、筹办常昭学务公所，丁祖荫出任常熟高等小学校长，张鸿京师西砖胡同寓所是常熟籍官员往来的据点，曾朴则活跃于报刊舆论界。他们参与地方政治的形式，以及对士绅权利的观念，都与诸世家大族不同，由此形成了常熟地方政治中的一股新力量。这支力量的初次登场，是在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之际的“中西学社”事件中。

（一）学风转变与“中西学社”事件

太平军进入江南之前，常熟拥有两所书院。文学书院又称虞山书院，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这座书院还负有祭祀孔门诸贤之一言子的功能，因此主要由当地的言氏宗族支持，明代以来兴废不定，太平天国运动后便完全废弃。游文书院创建于雍正三年分县之后，是常熟、昭文生员科读及考试童生的场所，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主要由粮储道资助。光绪六年，昭文知县陈康祺创设学爱精庐，得到庞钟璐支持。这所书院虽然也负责考试童生，但同时聘任院长，专门讲授“古学”即汉学。^⑤

①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第1247、1054、1161页。

② 徐兆玮：《虹隐楼诗文集》下，徐昂千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52页。

③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九日，第5版。

④ 《督办清理赋税局聂、朱会详清理赋税章程》，《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第4版。

⑤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上，第308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4《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2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202页。

同治初年，由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倡议建设学海堂、广雅书院，建立“经古书院”在全国成为一种风气。^①苏州的多数经古书院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后创建的。如苏州城内的正谊书院是科考时文制艺的书院，咸丰十年（1860）李鸿章率部攻克苏州后，将其改建为经古书院，“至是，乃专课经解古学。择诸生十人肄业其中”。^②又如昆山的玉山书院，本来也是科考时文制艺的书院，同治九年设立经古课，划拨学田资助。^③在此潮流下，常熟的两所书院也由专注于制艺，转而重视汉学、经世学。光绪二十六年，陆懋宗接替姚福奎执掌游文书院与学爱精庐的教席。他讲授经学提倡实学，由此当地士子多致力于经史研读，书院“文风为之丕变”。^④

表1 游文书院历任主讲者

时代	主讲人	评价
乾隆初	柏谦	
乾隆初	顾镇	以经师名天下
乾隆三十一年	蒋德	工于诗文
乾隆后期	朱光发	诗文有根柢
嘉庆后期	孙原湘	诗文雄长
道光后期	庞大奎	精于训诂
同治中期	李芝绶	擅长制艺
同治中期	苏文海	
光绪二十五年	姚福奎	
光绪二十六年	陆懋宗	提倡经世之学

资料来源：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

除书院之外，几个世家大族对当地学风也有深远影响。杨沂孙在家乡讲学多年，“里中后进，多讲求六书及诸子之学者，沂孙提倡之力也”。杨沂孙师从阳湖学派的李兆洛，此后倾心于段玉裁、王念孙之学，尤其是考据篆籀文字，或可认为也是接近于汉学、朴学的传统。庞鸿文对19世纪80年代以降的常熟士林影响很大，他反对毕沅、阮元等人的汉学传统，戊戌政变后，他返回常熟办理学堂，提倡新学与实业。^⑤这与太平天国运动后汉学兴盛的学风相比，又有所转变。

19世纪90年代之后，经世之学虽具有正统地位，但新学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新学传播是思想转型与学术制度的转型，更是财政资源的重新分配。自光绪二十二年之后，由于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办理新式学堂成为一股潮流。尤其是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上谕改书院为学堂，这更促进了各地兴建新式学堂。常熟的青年士绅也开始办理新式学堂，并与当地的世家大族发生冲突。光绪二十三年，潘任、徐念慈等人筹办“中西学社”；二十四年，季亮时等人还创办新式小学堂。^⑥当时类似的学堂还有徐仲凡在绍兴资助兴办的中西学堂，以及张之洞支持

① 陆胤：《经古学统与经世诉求——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的学派背景》，《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② 民国《吴县志》卷27《学校》，《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0页。

③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4《学校》，《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80页。

④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第1088页。

⑤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第1089页。

⑥ 季亮时：《常昭试办小学堂条例议》，《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第2版。

的江南储才学堂。^①章清认为“中西学社”与当时新兴的“阅报处”、“看报会”性质相类。^②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知新报》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即报道了中西学社的概况，^③可知维新派也将潘任等人视作同路人。

潘任、徐念慈等人兴办新式学堂是领风气之先的，但很快遇到阻力。“中西学社”的发起者潘任（毅远）是当地著名学者潘欲仁之孙。潘欲仁曾经在同治九年与杨泗孙共同主持重修文庙，^④可知潘欲仁在常熟士林具有很高声望。与潘任共同发起学社的还有丁祖荫、季亮时、曾朴、张鸿、徐兆玮、徐念慈、殷崇亮等人。^⑤学社兴办之始，就遭到了“乡先进”的批评与“邑巨绅”的阻碍，这些人正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如果仅从学术风气的转变考虑，双方的冲突似不可解。此时作为世家大族领袖的庞鸿文，也力倡新学。据说他“意欲冶治新旧学术，以救时弊”。他在此后的新政中是支持建设新式学堂的。世家大族与青年士绅之间的冲突，并不在学术取向上。《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登载一篇不署名文章，道出双方冲突的关键。

去岁有潘君毅远等立中西学社，乡先进丛指摘焉，潘君谋舍而赴鄂，举徐少逵编修兆玮自代。时编修方因事在沪，比回始悉情事，以为此固当务之急，而有万难兴办者，归并游文、学爱两书院则山长不能无去馆之虑也，经董不能无交卸之虑也，生童不能无涸辙之虑也，拨及别项公款则水利局不能无全局分裂之虑也，庙堂等捐不能无历年亏蚀之虑也，各有主者，各出其力，以相枝拄，其主者皆巨绅也，则官不敢顾问矣。^⑥

此文认为，地方公共事务的经营，依靠各种专门捐税，兴办“中西学社”，就势必要争夺别项事务的捐税。如常熟两所书院游文书院与学爱精庐，均设有专门的学田或“交典生息”基金。^⑦尤其是学爱精庐直接得到庞氏家族的支持。因此，从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转变，不能不牵扯到士绅的利益。用于地方公共事务的捐税，均由若干世家大族把持。“夫吾邑公款之历年侵蚀，如庙堂捐者，亦复何限，而主其事者父以传子，兄以诏弟，报销之清册，扃鐫于胥房，赢余之银钱，存储于私橐，偶有一二喜事之辈，举发其覆辙，狼起鹯顾，不排挤之不止。”^⑧改变这些捐税的用途，势必损害他们的利益。

《知难而退》发表于《申报》的当天，慈禧太后即已行使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四天后，上谕宣布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撤销时务官报，各州县新办小学堂由各地方官员酌情办理。^⑨而该文政治立场不仅与维新变法同调，且更为激进。“非暂停科举不足以一生童之趋向，非裁撤书院不足以杜山长之把持”，“夫欲扩充学社，潘君等才力优为之，欲建立学堂，非归并游文、学爱两书院不为功，天下事创议不难，众允为难，兴作不难，筹款为难，拨众公款，以建学堂，不啻合数巨商以立公司，必用投签公举之法，始足以孚绅民之望。”^⑩提议归并、裁撤书院，直

① 汤志钧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2、121、320页。

② 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85页。

③ 《江苏常熟昭文绅士创设中西学社叙（附章程稟批）》，《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第2版。

④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4《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2辑，第192页。

⑤ 曹家俊：《〈重修常昭合志〉总纂丁祖荫传略》，《常熟文史》第35辑，常熟：常熟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2005年，第39—40页。

⑥ 《知难而退》，《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第2版。

⑦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14《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2辑，第198页。

⑧ 《知难而退》，《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第2版。

⑨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30页。

⑩ 《知难而退》，《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第2版。

接损害了庞鸿文等世家大族的利益；继而将经营学堂比拟为合股公司，则质疑了世家大族依靠其威望把持地方公共事务的正当性。这篇论说显示出对于士绅与地方公共事务关系的新理解，包含了民主、公共等新观念。

徐兆玮正是《知难而退》的作者。此文是徐兆玮写给昭文知县郁保章的信，^①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徐兆玮将此信寄给申报馆编辑金剑花，所寄内容除“敝乡”被改为“虞山”，“某”被改为“徐少逵编修兆玮”外，两稿完全一致。徐兆玮自述已经习惯于写作报章体，^② 可见他比庞鸿文等传统士绅更善于利用新式报刊的舆论力量。徐兆玮的论说为“中西学社”打开了舆论空间，期间潘任又联络缪全孙等寻求支持，曾朴则与本地士绅力争，将用于修纂地方志与维护佛塔的米业公会捐输经费挪来资助学社。^③ 经多方努力，昭文知县将别峰庵划拨使用，于当年得以成立“中西蒙学堂”。^④

“中西学社”事件引起了维新派人士的注意，也凝聚了当地青年士绅的政治力量。潘任等人早已经形成较为密切的交往圈，并且被视为常熟青年士绅中的“名流”。潘欲仁是曾朴的蒙师，曾朴则是张鸿的密友，张鸿又与徐兆玮有姻亲关系，张鸿当时已被视作常熟年轻一代的文坛领袖，他在京师的常熟籍官员中十分活跃。同时，他们都不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对新学有较为一致的理解，而且善于利用新式报刊的力量。这个群体在此后的自治运动中也表现活跃，“中西学社”事件正是这股新政治力量兴起的一个征兆。徐兆玮等人与庞鸿文等世家大族的矛盾也由此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双方在地方志编纂、自治选举、学校、商会等事务中都不乏分歧与冲突，常熟的地方政治由此发生转型。

（二）刚毅清赋事件

光绪二十五年，刚毅清赋严重冲击了常熟地方权力格局，其影响远远超出赋税领域。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刚毅前往江苏巡视，他此行的清赋政策，以尽可能搜罗财税为主要目的，同时打击当地士绅。七月一日，刚毅在奏折中称：“三弊相因，举国家每岁应征熟田钱粮，合计不下数十万两，暗蚀于无形。顾弊在官可撤可参，弊在书差可斥革惩办，独弊在绅户，大半缙绅望族，其中洁清自好，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倚此为生，声气广通，奥援遍树，欲图整顿，倾陷随之，官斯土者遂不敢议及清赋。”^⑤

其奏折中提到的绅户包抗钱粮的弊端在江苏确实存在。道光时期，苏南曾普遍存在“大小户”与“漕规”，高级士绅利用特权转嫁赋税负担，生员则要挟地方官以收取规例。^⑥ 太平天国运动后，经李鸿章、冯桂芬等人整顿，“大小户”的赋税征收不公有所缓解，“漕规”则几乎被

① 徐兆玮：《虹隐楼诗文集》下，第745页。

②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23、101页。

③ 张鸿：《籀斋先生哀辞》，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81—682页。

④ 杨瑞民、郑耀民整理：《晚清时期的办学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15辑，常熟：常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第161—162页。

⑤ 刚毅：《奏为筹办江苏省清赋事宜事》，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一日，朱批奏折录副，03—6263—0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赵思渊：《十九世纪中叶苏州之“大小户”问题》，《史林》2012年第6期。

灭绝。光绪初年，任昭文知县的陈康祺自称“职业清简”，漕粮征收给地方造成的冲突大为减少。^①不过，士绅包揽钱粮在当地仍然存在。1905年，常熟人孙景贤创作的小说《轰天雷》改编自当地士人沈鹏的经历，小说描写沈鹏中进士后，立刻有不少同乡前来拜访，并劝他利用自己的进士身份谋取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包仓米，管闲事”，并说这是“故乡的时事”。所谓“包仓米”，“中了举人，自己的钱粮可以不完。自己如没有田产，亲友们及一切不干涉的人，只要将田过了你的户，你在衙门里招呼一声，也只要完二三成好了。只要户头多，一千八百块钱算不得什么，这不是白用他的么？”^②张鸿是沈鹏的好友，他的小说《续孽海花》中，也专门有两个章回描写沈鹏，其中写到当地士绅包揽漕粮，与《轰天雷》所述相似。“后来北山（沈鹏）中了北闹的举人，他们已经变了论调，说道：‘他从小是很聪明的，所以年纪很轻就中了。’此次何妨回来开开贺，两漕上自然应当送一份礼，我们合族的钱粮，他只要说句话，一定可以卖账的。我们也可以占些便宜，他也可以得些实惠。”^③

由此可见，19世纪90年代苏南举人包揽漕粮已经十分普遍，因此孙景贤称之为“故乡的时事”，在时人看来甚至是一种正当的“副业”。士绅必须拥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才有资格与巡漕御史直接交往，从而能够多立户名，将他人钱粮寄托自己名下，包揽短交，从中获利。19世纪末，常熟也有不少举人、进士参与其中。他们在包揽之外，还进行所谓“闹总房”，即要求漕书为北上参加会试的举人出钱，实为一种变相的索贿赂。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继良，曾参加光绪二十四年的“公车上书”运动，^④他在北上前曾殴打漕书，引起一时轰动。^⑤

刚毅打击士绅包揽钱粮，有其合理性，但士绅包揽必须依靠地方官、漕书的合力才能实现。刚毅认为，官员与漕书都容易处置，只有士绅才是此次清赋的处置重点，尤其是其中的“缙绅望族”。刚毅在下达江苏布政使聂辑规的札文中，强调“以筹饷为要务”，因此要求当年漕粮征收要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惯例七成提高至足额征收。至于清赋该如何施行，刚毅主要强调清查民间买卖田产的过税册籍，由此“可绝大户之包揽”。江苏布政使聂辑规、候补道朱之榛据此执行的具体措施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查“以熟作荒田亩”以及“如有刁绅劣监违抗阻挠，应如何尽法惩治”。^⑥刚毅要求严查田产买卖契税，增加税收之外，还要清查田产所属业主，以杜绝大户包揽。刚毅在上奏及下达的札文中，都承认田赋弊端由三个因素构成，即州县匿报、绅户包抗、书差侵蚀，但政策实施过程中并没有针对官员和漕书的处置方案，而是将焦点集中于处置绅户。聂辑规在刚毅命令下设立清赋局，根据刚毅的札文施行清赋，禀稿与刚毅的基调一致，认为漕粮征收“揆之定额尚短十分之二，固由荒田未尽辟，实亦捏熟作荒居大半”，重点打击的“短完包抗之辈”也即地方士绅。显然，清理田赋是对江苏士绅的政治打击。

通过清查田赋，在政治上打击江苏士绅，也是从常熟开始的。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常熟籍举人归宗郁因拖欠漕粮与漕书汤敬恩冲突，归宗郁的母舅副贡生庞鸿儒联署10人向苏州府上控，但反被苏州府知府彦秀处置，准备革去功名。^⑦庞鸿儒是庞鸿文的同族，此案由此牵连到常熟最具威望的家族。此时常熟的世家大族中，尚在朝廷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仅有杨崇伊。他去信

①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② 藤谷古香（孙景贤）：《轰天雷》，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第30页。

③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1页。

④ 汤志钧编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653页。

⑤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63页。

⑥ 《督办清理赋税局聂、朱会详清理赋税事宜禀》，《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第3版。

⑦ 《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第3版。

江苏巡抚德寿，称此事“阖邑公愤”，希望中止对归宗郇、庞鸿儒等人的处置。但不久刚毅就到达江宁，也注意到此案，他立即向德寿施压，要求其向朝廷上奏此案件，以加重处罚。^①五月二十六日，德寿将此案上奏，^②七月九日，归宗郇、庞鸿儒审理比照诬告反坐罪处置，罪罚本应在不到百杖，但归宗郇被判以“闯入县署二堂咆哮，捏词抗辩，实属狂妄”，庞鸿儒则是“知情代作词状，照律与犯人同罪。”两人“各拟杖一百，照例详革”。^③

归宗郇案件是刚毅南巡期间的重要案件。此案处理过程中，未遭到地方士绅的有力抵制。归宗郇案件为刚毅提供了打击士绅的借口，从而达到了“革一归孝廉以儆其余，而群绅缄口”的效果。^④在此震慑下，以包抗钱粮的名义打击士绅不会再遭到强大阻力。七月一日，刚毅的《会奏江苏清赋事宜折》中说明江苏士绅包抗钱粮的证据有二，其一是借善堂名目隐匿税额，其二即归宗郇案件。归宗郇出身常熟，案件的另一主角来自庞氏家族，这使得案件更加敏感。刚毅在政治上强烈敌视翁同龢，甚至坊间传闻刚毅“因平日极不喜翁常熟（同龢），一并将天下读书人而以最坏目之也”。^⑤常熟自然成为他南巡中的焦点。

此时翁同龢已被禁革在家，庞氏领袖庞鸿文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末奏请开缺回籍，直接原因也是“是时当戊戌政变之后”，^⑥两大家族在此案中毫无作为。受到戊戌政变影响而离开京师或去职的常熟籍京官还有多位。常熟籍士绅孙同康的《劝修塔歌》发表于《苏报》，其中说“京官本有三十人，现在剩了四个人。或死或革或丁忧，或告养亲或病休”。这是当时常熟士绅政治影响力衰落的真实写照。徐兆玮将这种情形称为“邑运之衰”以及“人自为谋，大局涣散”。常熟籍官员在政治上的失势，直接削弱了维护地方权益的力量，常熟士林也由此而“糜烂不堪”。^⑦六七月间，聂辑规、朱之榛主持的清赋局清查江苏各地的荒田与契税，重定契税折价，颁布清赋章程。七月初，苏州各县将清查荒田、契税造册上报。^⑧期间不少士绅都遭到清查。陆懋宗是常熟游文书院山长，当时也遭到清查。小说家曾朴则被彦秀羁押，不久被迫逃离常熟。^⑨十月，杨崇伊上奏质疑清赋太过严厉，鹿传霖继任江苏巡抚后，清赋政策有所缓和。^⑩

刚毅清赋对常熟士林的政治打击，很快即引起剧烈反弹。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常熟籍士绅翰林院编修沈鹏请翰林院掌院徐桐代奏《应诏直言折》（以下简称“奏稿”），不获允许，于十月转交《国闻报》发表。^⑪此奏稿中将荣禄、刚毅、李莲英并称为“三凶”，奏请弹劾“三凶”，严加处置。其中对刚毅攻击最重，称其“钩稽党籍”以及南巡清赋。沈鹏说：“乃刚毅之筹饷江南也，则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闾阎惊扰，而又裁撤学堂，催伤士气，省数万有限

①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82页。

② 德寿：《奏为申明常熟县举人归宗郇包漕牟利捏词诬告斥革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录副，03—6317—0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第12版。

④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83页。

⑤ 《论读书人》，《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第2版。

⑥ 庞鸿书：《清故通奉大夫通政使司副使先兄纲堂庞公墓志铭》，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191页。

⑦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169、80、93页。

⑧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日，第2版。

⑨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82页。

⑩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九日，第5版。

⑪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第3版。

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① 相较而言，奏稿中对荣禄、李莲英的攻击更多是泛泛之言，只有针对刚毅的批评是有具体事件的。沈鹏的奏稿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国闻报》此后又接连报道沈鹏事件的处理过程，声援沈鹏。^② 维新派主持的《知新报》也很快转载奏稿，不久又发表署名侑竹喜报馆主人的文章，称奏稿已经“报纸刊传，地球遍诵。已足挾三凶之奸私，而褫其魄”，并称赞沈鹏“不知天地间有生死，只觉心目中惟君国”。^③ 沈鹏的奏稿给慈禧太后、刚毅等人带来很大震动。沈鹏是翁同龢的学生，刚毅怀疑沈鹏受到翁同龢指使，甚至欲杀翁同龢。^④

沈鹏攻击刚毅并非翁同龢授意，翁同龢的侄子翁斌孙尤其紧张，尽力避免此事牵连翁同龢，要求在京的常熟同乡尽快将沈鹏带回。^⑤ 民国时丁祖荫、徐兆玮编纂的方志中称沈鹏此举是“戊戌政变以后，重臣当国，阉寺稍稍窃朝柄。私愤国是日非，鉴于祸患之将作”。^⑥《轰天雷》中则将之归因于婚姻不谐，精神抑郁。^⑦ 但是，他的行动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意气之举，而是受到常熟青年士绅群体的影响。钱仲联自述，曾得张鸿亲口告诉，沈鹏之奏稿由张鸿撰写，外界多不知此事。^⑧ 张鸿所撰小说《续孽海花》中，也曲折地述及此事，第六十回写到“仲玉就将他的稿子改成了一千多字”，^⑨ 仲玉即张鸿的化名。沈鹏的奏稿不论出自张鸿之手或由张鸿修改，都是这一群体政治主张的体现。《轰天雷》中记述在京的常熟士绅议论沈鹏奏稿时说道：“此段说刚毅，却也痛快。我们正是被他清赋，弄得像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⑩ 这凸显了常熟青年士绅群体与刚毅的政治对立。

三、“士气”与民权：常熟士绅的身份意识

戊戌政变后，张鸿、徐兆玮等人结成的这一士绅群体，具有怎样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思想？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张鸿写给徐兆玮的信中，可见一斑。

吾乡清赋税契情形若何？际此时势，尚欲如前三十年，充乡绅包漕米者非特无耻，抑且冥顽。仆意吾乡宜立农学会，仿《农报》所登《瑞安分会章程》。此事不求速效，先求会友。常年会金不必多取，只存其名而已，每年一元可矣。只求会友众多，爰力自大，以后拨公款、集股分均易易矣。设立会所，公举总董，会中办事必以公允有恒为首，日后诸人信服，自可推行。如以为可望，先草章程，刊立公启，弟名附末，次第签名。公所设立总簿登记，并登上海《农报》以广声气。弟于南西门外丰台左右拟租地数十亩，试种美棉，如有成效，亦可归入会中，再行推广。且此会宗旨不仅一乡一邑，如同志既多，则经营天下即可于此发轫。欧洲大事如英之议院、美之免奴，其始皆起于一二人之议论，迨后党会日广，权力之大足以握朝政而威敌国。吾辈际此时势，不可无此志愿，未审足下以为何如？

①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第3版。

②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③ 《读编修沈鹏天灾应诏直言二折书后》，《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第2版。

④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3版。

⑤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132页。

⑥ 丁祖荫、徐兆玮编纂：《重修常昭合志》下，第1090页。

⑦ 藤谷古香（孙景贤）：《轰天雷》，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第102页。

⑧ 钱仲联：《清诗纪事》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520页。

⑨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第393页。

⑩ 藤谷古香（孙景贤）：《轰天雷》，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第97页。

弟意中国必君民共主，方可富强，能借此会以为唱道民权之用，尤善。自由独立，世上公理，此弟之微志所在，然此时尚愿秘之，恐闻者骇异也。^①

张鸿已经将民权视作重要的政治理念，并且认为士绅应当代表民权、伸张民权。其途径，则是组织农会解决土地问题、田赋问题。他批判家乡的士绅包揽赋税，设想建立农学会讨论田赋分配，进而伸张民权。这一议论仍然由刚毅清赋引发，但是他更注意“时势”变化，欧美的议院政治，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源。因而，他期望设立会所，选举总董，这意味着当地拥有大田产的士绅都组织起来，建立共同监督与商议的机关，这将不仅是解决田赋与农业问题的平台，也意味着士绅、地主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深刻地影响地方事务。由此必然地提出民权、自由独立等政治思想。此时正是晚清政治气氛最保守、最压抑的时期，^②“民主”、“民权”更是被打击的“莠言”。^③张鸿也担心自己的主张“闻者骇异”。徐兆玮接受并支持这些思想，他在回信中说：“初七日得手书，略知近况，又从美叔弟处读家报，备悉近日留心农事，纤屑无遗。仆本村人，稍谙种植，今岁任阳之稻已庆有秋，尚思推广千亩，围圩开塘，为独立自由之计，但同志寥寥，无从商酌，为一憾耳。”信中所说的任阳，是他在当年二月开垦的荒田，开垦这块荒田，也是为了“独立自由”，曾经参与“公车上书”的常熟士绅张继良也参与了此事。^④

这些都说明，常熟青年士绅普遍地以伸张民权为政治理念，并在地方政治中予以实践。甲午战争后，“权利”概念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并广泛使用；维新变法中，“兴绅权”以伸张民权更是梁启超的重要主张。常熟青年士绅始终将绅权、民权与土地、田赋紧密联系起来，刚毅清理田赋，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这种政治思想。徐兆玮六月二十九日给张鸿的信中说：“愚前书谓不办清赋则士气无由而伸，实以吾邑积习，人自为谋，大局涣散，匪伊朝夕。今因遭此凌辱，而思有以自振，惟有首先纳赋，以为齐民表率，舍此更有何法？至于胥吏因缘为奸，此则吾辈所当言之责，弟所以有《清赋末议》之作也。”^⑤徐兆玮信中所提及的《清赋末议》，提出了“士气”与田赋问题的关系，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特征，以及以士绅为民权代表的身份意识转变。

（一）士气：士绅的责任感与地方利益

《清赋末议》是以“劝”为题目的四篇文章，分别针对官、绅、吏、民。其结构类似于冯桂芬的《均赋四劝》，其针对的则分别是官、绅、衿、民。徐兆玮在《清赋末议》篇首说：“矧吾吴粮户冯林一（冯桂芬——引者注）所谓除无主赔绝千分之一外，从来不闻民能欠粮者。但患陋规之难于尽革除，不患民欠之无从弥补。”^⑥这段话出自冯桂芬的《清赋说劝官》，原文是“其实吾吴粮户除无主赔绝千分之一外，从来不闻民能欠粮，所谓民欠，即前所谓丁胥包欠”。^⑦这说明徐兆玮文章的写作结构承继自冯桂芬。

①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119页。

②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③ 《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第1版。

④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121、67页。

⑤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93页。

⑥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102页。

⑦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均赋说劝官》，《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5册，第672页。

张仲礼最早注意到冯桂芬提出的士绅平等纳税原则，^① 高桥孝助则认为“均赋论”体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乡绅对地主制的新理解：通过解决乡绅内部矛盾从而强化代表地主制的国家权力。^② 高桥孝助的解读与小山正明等的乡绅支配论关系密切，将晚清国家理解为乡绅地主的权力集合体，这显然不能全面解释晚清国家的特征。冯桂芬的“均赋论”针对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前赋税不公问题中的三种人群，即地方官、士绅（绅与衿）以及平民。冯桂芬区分了两类士绅，举人以上的高级士绅（“绅”），生员等低级士绅（“衿”）。生员常常包揽漕粮，向地方官索要漕规，而高级士绅则主要是短完钱粮，他们在赋税不公问题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表 2 冯桂芬《均赋四劝》与徐兆玮《清赋末议》比较

冯桂芬	徐兆玮
《均赋说劝官》	《清赋说劝官》
《均赋说劝绅》	《清赋说劝绅》
《均赋说劝衿》	《清赋说劝吏》
《均赋说劝民》	《清赋说劝民》

资料来源：冯桂芬：《显志堂稿》卷 9，《续修四库全书》第 1535 册，第 672—675 页；《徐兆玮日记》第 1 册，第 101—105 页。

徐兆玮的《清赋末议》中，“衿”由“吏”取而代之。经清廷整顿后，生员索要漕规、“告漕”等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生员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在田赋问题中的影响大为削弱。徐兆玮所写的“劝绅”，针对的已是整个士绅群体。另一方面，胥吏在田赋问题中的作用成为徐兆玮写作的重点。田赋、漕粮征收中胥吏舞弊，是赋役制度中的常见弊病。冯桂芬将此作为地方官的责任，否定胥吏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胥吏是州县官的“蠹蠹”与“仇讐”。“事涉漕务，一切皆丁胥主之，领银唯命，截串唯命，捉某户输某衿唯命，忽拥之坐堂皇，忽驱之诉长吏，皆唯命，非所谓我为政者乎？丛怨于绅衿，肆虐于平民，小而讦讼，大而闹漕，身败名裂，官实当之，非所谓任其咎者乎？然则州县之蠹蠹也，而引之为爪牙；州县之仇讐也，而奉之为师保。”^③ 与此不同，徐兆玮承认胥吏存在的合理性。“官如传舍，吏如积薪，前车倾覆，后辙锐进，利藪所在，趋者若鹜，诚不意铜山有时而崩颓，金穴有时而锢闭。数百年之利权一旦攘夺于长官之手，乃更舞文玩法，罔上行私，此所谓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与其逐微末之利，而以身试法，何若循分守己，进可以备员佐贰，退亦足贍育身家。”^④

地方官与胥吏的关系，徐兆玮理解为“传舍”与“积薪”。“传舍”即驿站，以此比喻官职，“积薪”喻层层累积，清代州县官衙中的胥吏常常经年累月任职，甚至有世袭者，^⑤ 徐兆玮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状态。“前车倾覆，后辙锐进，利藪所在，趋者若鹜”则是指胥吏阶层的生存状态。胥吏随时有可能被惩处斥革，但由于利益所在，新的胥吏又会涌入。即使能够把持“利权”即赋税征收的权力，但随时都有可能被惩处，其前途是“强弩之末”。徐兆玮认为胥吏阶层的正途应当是安分守己地工作，或者有可能晋升佐贰官，至少可以维持自己的家业。这样的观点与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昌荣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第 41—43 页。

② 高桥孝助：《咸豐三年前後の江南における均賦論》，《宮城教育大鑑紀要》1975 年第 10 輯。

③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 9《均赋说劝官》，《续修四库全书》，第 1535 册，第 672 页。

④ 《徐兆玮日记》第 1 册，第 105 页。

⑤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65 页。

冯桂芬显然是不同的。徐兆玮所针对的胥吏，主要是各县负责钱粮、漕粮征收的漕书。这种职役可能设置于雍正五年，协助知县负责一县的田赋征收，如果连续五年没有亏空，漕书即可晋升九品杂职。这符合徐兆玮所提议的安分守己以“备员佐贰”的说法。当年五月，常熟籍举人归宗郛由于殴打漕书汤敬恩，被斥夺举人身份，诉讼的另一方漕书汤敬恩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当时舆论认为归宗郛案件对士绅的处理太重，而胥吏则逃避了责任，“此次归宗郛虽有不合，然苟非汤敬恩实有弊端，亦岂有不蠹之木而遽遭虫蚀哉”。^①

同治初年的减赋中，地方士绅发挥了主导作用，光绪末年的清赋中，地方士绅却被严厉打压。因此，徐兆玮比冯桂芬更强调士绅在田赋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与责任。冯桂芬要解决的是士绅造成的田赋征收不公问题，他更多从道德角度劝说士绅让出“大户”短交赋税的特权。在他看来，士绅正额缴纳赋税，承担相应的责任，是一种“好善”的行为，也是一种“功德”，士绅救灾恤贫是在积累功德，正额缴纳赋税也是积累功德。“夫冒难处之名，沽多方之怨，酿将来之祸，造无形之孽，而仅获此毫末之利，稍有识者，必不为此矣。吾吴以好善为俗，救灾恤贫之举，甲于天下，顾凡百善举，出一钱人止受一钱之惠，若此事则我所损者数十金数百金止耳，而人之受惠者不啻恒河沙数，吾辈力薄，正宜行此不甚费钱之功德，舍小利而积大善，计无便于此者，窃愿诸公共勉之矣。”^②徐兆玮面对的是朝廷、地方官、漕书对士绅的多重打压，因此在他看来，解决田赋问题，是要维护士绅自身的尊严与社会权威，也就是“为吴中延一线之士气”。“盖绅户之藩篱荡决尽矣，仅存此饬羊之名，留为官吏口实而已……何苦吝惜一二成之漕尾，不愿为衙蠹所中饱，反甘与匿报之州县、舞弊之书差分受此包抗之恶名乎？今既实征实解，上裕天庾之正供，下杜奸胥之侵蚀。凡在搢绅各宜争先输纳，为民户倡。州县不得以声色相加遗，总书不敢以尔汝相轻侮。庶几为吴中延一线之士气，而不至荡焉渐灭也！”^③

晚清文献中，“士气”的内涵涉及士绅的身份意识与自我认知，如当时一份讨论办理新式学堂的奏折中说，“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受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以养士气而专责成”。^④士绅被认为应当区别于专业的工匠、军人，关心比专业技术更形而上的问题，从而培养“士气”。这里既包含了身份意识的区隔，也存在学术取向、人格修养的差异。“士气”一词在徐兆玮论说的语境中，则始终与田赋问题紧密关联。徐兆玮认为清赋之后，“吾邑士气斫丧已极”。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遇有一二公事辄噤若寒蝉，暗若仗马，恐言之而触当事之忌，则我之额外钱粮将因此发动也”。^⑤维护绅户“士气”的“藩篱”毁败荡决，所谓的“士气”与“藩篱”正是士绅与官吏对等议事的政治身份，以及支撑这种身份的社会观念。

“士气斫丧”与“藩篱荡决”都说明了士绅身份感的沦丧。一方面，士绅应当遵守道德操守与一定的处事原则，从而建立社会威望，但因为包揽词讼、开场聚赌、拖欠钱粮等，其社会威望被削弱了。另一方面，徐兆玮认为士绅本应主导地方事务，但由于政治上遭到打压，对于地方公事“恐言之而触当事之忌”。徐兆玮如此重视“士气”，正是因为他将士绅置于地方社会与

① 《论绅衿包抗钱粮》，《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第1版。

②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均赋说劝绅》，《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册，第673页。

③ 《清赋说劝绅》，《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102页。

④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51—552页。

⑤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88页。

地方政治的核心位置，这种身份意识，来自经世学传统与新学中的民权观念。

（二）经世与民权：“士气”论的思想脉络与指向

徐兆玮在《清赋末议》中并未直接提出经世、民权等概念，但翻检《徐兆玮日记》中对时事的议论，以及与友人的通信，可以发现清初江南的几位学者对他的影响十分深远。张鸿与徐兆玮的通信中，经常提及“君民共主”、“自由独立”等，这显然是受西学影响而形成的新观念。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江苏布政使聂辑规与清赋的实际执行者朱之榛联署发布禀稿，公布清理田赋的详细办法。徐兆玮同意禀稿中打击“以熟作荒”的政策，但认为“不易扫除”，而对于清查田产买卖契税的政策，则认为根本无法办理。^①二十九日，徐兆玮给张鸿写信时就表示自己将写作《清赋末议》，同一天，他还在日记中写道：

今人喜谈经济，我谓未易言也。近而一邑一乡，我所生长之地，岁输地丁、漕米之数，胥吏所以舞弊者何在，如何而使弊窦永绝，求之简策而格格不入，求之绅耆而依约以对，又不可率臆妄断也。博稽之而细核之，十止能得五六，其难若此。则夫远适千里，风土异宜，言语异音，更何以周知其利弊而为之区处乎？读《经世文编》，顾亭林、陆桴亭所论赋役，今时则翩其反矣，故经世之学有二要：一曰因地，一曰因时。^②

从徐兆玮阅读《清经世文编》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对顾炎武、陆世仪思想的承继与改造。《清经世文编》收录顾炎武、陆世仪讨论赋役的篇目中（表3），《钱粮论》反对粮税改折征银的做法，^③而在徐兆玮的时代，钱粮折银不仅是通行的做法，亦少有人反对。另外，《论鱼鳞图册》中，陆世仪认为赋税征收应当废黄册专用鱼鳞图册，即“以人从田”的原则。^④这是明清之际江南均田均役改革的主流观点，^⑤但经历了乾隆年间“顺庄编里”改革后，清代中后期赋税征收进而转变为以纳税花户为中心。^⑥赋税登记方式的转变过程可归纳为，“以人从田”向“以田从人”转变。也就是说，徐兆玮时代通行的赋税制度就现象看与顾炎武、陆世仪时代相反。可能基于这种认识，徐兆玮认为顾炎武、陆世仪的时代，即明末清初，与清末讨论赋役的观点相反。他由此得出经世之学的两个要点：因地、因时。

表3 《清经世文编》收录顾炎武、陆世仪文章篇目

顾炎武		陆世仪	
篇目	卷次	篇目	卷次
《钱粮论》	卷29，赋役一	《论赋役》	卷29，赋役一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卷29，赋役一	《论鱼鳞图册》	卷29，赋役一
《垦田均田》	卷31，赋役三	《漕兑揭》	卷46，漕运上
《州县税赋》	卷31，赋役三		

①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88页。

②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94页。

③ 顾炎武：《钱粮论》下，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上，第704页。

④ 陆世仪：《论鱼鳞图册》，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上，第714页。

⑤ 参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⑥ 岩井茂树：《清代の版图顺庄法とその周边》，《东方学报》第72号，2000年，第381—499页；山本英史：《清代中期的地域统治》，东京：庆应大学出版会，第340—348页。

续表 3

顾炎武		陆世仪	
篇目	卷次	篇目	卷次
《地亩》	卷 31, 赋役三		

资料来源：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另外，阅读陆世仪《漕兑揭》时，徐兆玮认为顾炎武的倾向是“师古”，陆世仪的倾向则是“通今”。“通今”的含义是针对时事提出补救其弊端的办法。清初学者中，顾炎武、陆世仪都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陆世仪尤其强调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切于世用”的学问，认为这类学问才是“亟当讲求”的。^① 同时他还认为“补救偏弊”的根基，是以“封建、井田、学校”等儒家理想为基础创设制度。对于陆世仪因时补救偏弊的思想，徐兆玮大为赞赏，渴求当世能有如陆世仪那样的政治家。但对其“以封建、井田、学校为本”的思想，却提出质疑：“不知封建、井田何以能行之无弊也？”说明徐兆玮并不认为制度改革应当以古代理想为范本。在顾炎武与陆世仪之间，他更倾向于“通今”的陆世仪，认为“黄梨洲、顾亭林之言不可行者多。陆桴亭、陈确庵之言则可行者多”。^② 在陆世仪的“根本立法”与“时事救弊”之间，徐兆玮又倾向于后者。

徐兆玮积极接受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新制度与新思想，不同于很多希望从儒家经典立意出发解决现实问题的士人，他对这一路径即使不否认，也缺乏兴趣。对徐兆玮来说，解决当下问题的出发点应当是现实本身，而不是儒家理想或儒学原典。笔者将徐兆玮思想概括为“务实主义”，这一归纳可能简化了其思想的复杂性，但它帮助我们明晰了徐兆玮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徐兆玮在《清赋末议》中所提出的“士气”论，实质是一种论述士绅如何参与地方政治、重塑自我身份的政治理念。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见解，也反映了青年士绅的共同思想。这种观念的渊源来自清初顾炎武、陆世仪等人的经世之学，但其发展的方向则是与西方的民权、自由独立等政治理念结合。不过，同样不应忽略的是，对于徐兆玮或张鸿来说，“民权”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士绅参与地方政治提供制度保障，普通民众是否拥有“民权”，以及如何参与地方政治，恐怕还不在于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结 论

从常熟的地方政治发展可以看出，清赋问题是清末民初士绅身份意识转变与“绅权”变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维新变法通过“兴绅权”以伸张民权，绅权的核心则是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③ 然而士绅如何控制公共资源？事实上，围绕田赋征收而形成非正式的地方经费体系，是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的基础。^④ 新学为青年士绅提供了改变公共资源控制方式的思想资源，吸引着他们重新塑造士绅身份意识。

1893—1911年的近20年间，常熟青年士绅利用报刊、学堂、自治运动等新手段，逐渐取代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4页。

② 《徐兆玮日记》第1册，第56、81页。

③ 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了传统士绅通过书院、捐税、世家大族之权威所构建的地方权力格局。这个过程中，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之间，是他们形成新的身份意识的最关键时期。他们将士绅视作民权之代表，代表民权的途径，则是改变田赋征收与地方经费体系。

身份意识的转变是由新学与经世学思想资源的有机结合、地方财政与高层政局变动共同促成的。甲午、戊戌之际，新的学术与政治观念在常熟士绅中广泛传播，常熟青年士绅徐兆玮、张鸿、潘任等人通过创建新式学堂，组成新的政治力量。戊戌政变之后，翁同龢失势直接导致常熟的“士气”衰落，刚毅清赋则进一步打压了当地士绅，徐兆玮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士气论”，认为清赋、士绅对地方社会的责任与士绅的身份密切相关。这种思想融合了经世之学传统与民权等新观念，反映了清末士绅身份意识与政治理念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影响下，张鸿等人还试图创建农学会，由地方士绅管理田赋问题，从而形成新的地方政治结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些理念虽然无法实施，但对民国初年常熟的政治运作产生直接影响。

1912年，江苏省实行自治后，常熟县进行议会选举，徐兆玮、丁祖荫等人也都积极参与其中，丁祖荫当选民政长，徐兆玮当选议员，且曾担任代理民政长，^①张鸿之弟张洵执掌财政。^②被视作地方大族的翁氏、庞氏、杨氏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却一无所获，庞氏在政权更替中，甚至遭到乡董、胥吏的围攻。^③经过政权鼎革，徐兆玮等人所凝聚成的政治力量开始主导地方政治，旧的政治力量则逐渐衰落。追溯这种变化的起源，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正是关键的转折点。凝聚新政治力量的政治理念，则是徐兆玮的“士气论”中所表达的核心观念，即士绅对地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隐含的民权观念。清末自治运动以及民初议会选举中常熟地方政治的走向，直接受到戊戌政变前后这种变化的影响。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或将提供理解士绅身份意识转变的新角度。

〔作者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上海 200140〕

（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审：路育松）

① 《徐兆玮日记》第2册，李向东等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1230、1352页。

② 徐兆玮：《虹隐楼诗文集》下，第894页。

③ 《徐兆玮日记》第2册，第1227页。

Tianwen fenye (the earthly correspondences of the heavenly constellations) was a popular belief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smos and the earth in premodern Chinese society. It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astrology-influenced politic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view in middle antiquity. However, beginn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many of the scholarly elite mounted harsh attacks on this thinking, citing its internal logic, changes in geographic disposition, and 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s. This criticism shaped a general trend of rejection of the theory. In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the Qianlong Emperor took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theory, and with Li Linsong's complete analysis of its deficiencies in his *Xing tu shi* (Explaining the stars and the earth),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ianwen fenye* finally came to an end. On one hand, from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had collapsed, so consulting the stars lost its status in knowledge and belief systems; this was the internal reason for its declin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Western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knowledge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ere they had a huge impact. The end of the traditional *tianwen fenye* theory was the result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Men (Door) and Men-Shaped Genealogies in the Clan Lineages in Qin County: With Comments on the Two Types of Practices in Chinese Clan Lineages Qian Hang(52)

Fang (house) and *men* (door) have always been used to identify the branches within Chinese clans. The *men* in the lineages of clans in Qi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ever, has additional meanings. Here the central idea that *men* identifies is a same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thers, rather than a father-son relationship; brothers can either occupy one *men* each, or share one *men* with several oth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men* of the same generation can be first to fourth collateral relatives.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men* w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 clans in Qin County; it also reflected their desire to integr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rothers in order to enhance cohesion between clans.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 that "relatives behave appropriately as relatives." Defining genealogy using *men* does not affect the original succession system of each branch; in terms of inclusiveness, it is similar to the alliances between geographically close *fang*, but it was much less artificial. *Men* and the genealogy it defined can be regarded as a practice in drawing up lineages that differs from the definition of lineages using *fang*.

The Fence of *Shiqi*: Changes in the Gentry's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as Reflected in Late Qing Land Taxes in Changshu Zhao Siyuan(70)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ongzhi reign, a power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prominent families took shape in Changshu. During the Wuxu Coup of 1898, these families became involved in the power struggles at court. Weng Tonghe and others became political opponents of Gang Yi, a trusted follower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After the coup, Gang Yi reorganized the land tax,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aunch political attacks on the gentry of Changshu. Young men among the Changshu gent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local power structure, organized a *Zhongxi Xueshe*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society), competing for local funds controlled by the prominent families. They were also unhappy about Gang Yi's political attacks. Shen Peng published a draft memorial impeaching Gang Yi and others in *Guowen Bao* (National News), shocking both the court and the localities. Xu Zhaowei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shiqi* (spirit of the gentry), arguing that the gentry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levying the land tax, participate in local affairs, and promot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Reflecting the prevailing view among the

young gentry of Changshu, this approach came from the tradition of pragmatic statecraft in the thought of the Jiangnan region; i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Western ideas of civil rights. After the Gengzi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young gentry in Changshu who accepted the *shiqi* theory became dominant in local politics, creating a new local power structure.

Britain's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Twenty-one Demands" Hou Zhongjun(86)

After Japan handed the Twenty-one Demands to China, it sent a notification to Britain in which the fifth demand was deliberately concealed. Having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the fifth demand, Britain initially understood it as a Japanese bargaining chip, but quickly changed its approach, ceasing to regard the fifth demand as an "aspiration." Britain made two proposals to Japan: first, if Japan's demands on China would harm Britain's interests there, Japan must first consult with Britain; and second, Japan should not contravene the intentions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made Japan decide to suspend the fifth demand to China. Britain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uropean theater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 was unable to spare energy for events in the east. It did not wish to se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o after Japan's ultimatum to China, it persuaded Japan not to resort to for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urging China to accept the ultimatum. Safeguarding Britain's interests in China w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Britain's med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 the Twenty-one Demand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Decline of Fishery in the Poyang Lake Are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u Zhui(104)

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of the Poyang Lake area, fishe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oyang Lake area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decline of fishery"; agriculture saw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but fishery declined rapidly. The dynamics of this process included population growth,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changes, a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invited reclamation, and the fact that paddy fields had a higher economic value than water areas. This process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oyang Lake area an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general. The deterioration was mainly exhibited in frequent and intensified floods, drough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iodiversity. We should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Marxist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friendl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Exchange, Justice and Usury: Thomas Aquinas's Economic Ethics Liu Zhaojing(119)

Thomas Aquinas's writings on usury reflect the response of the Church to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ethics, a problem which had a long history but which became far much important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especially in the 13th century. The forms in which Aquinas handles the topic—e. g. his *disputationes*—serve his economic ethics and are not open-ended. He considers usury to be legal under human law but unjust under divine law/natural law, this being in conformity with his theory of law. He thinks that the property of a thing changes with its use; keeping this in mind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better why he sees money lending at interest to be unjust but house leasing and *societas* just. His argument that money is sterile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compensation for the possible loss of profits are consistent throughout, not contradictory as has hitherto been claime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as he sees it corresponds to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where as lending money for *usura* corresponds to the intrinsic value of money; this does not support the